

作家写作家

赵叶惠：守望与歌吟

彭伟平

赵叶惠有一摞保存了45年的小说手稿，这是他写的第一部小说。1979年，赵叶惠考入湘潭地区农校。1981年暑假，他利用守校的机会，夜以继日地创作酝酿已久的一部小说，最终写出一万五千多字的《爱情与友谊》，寄给上海《萌芽》杂志。一个月后，收到了编辑的回信：希望他修改以后再寄去。他觉得自己已被小说淘空了，想放一放再改。后来由于临近毕业，学习和实习任务重，就没再改。他说：“这部手稿和编辑的回信在时光深处仍然散发着光和热。”

此后，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，赵叶惠从未停下脚步。

1983年7月，赵叶惠和五位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成立了龙城青年读书会，并组建了湘乡第一家文学社——绿地文学社，编印《绿地》刊物，他担任会长和首任《绿地》主编。绿地文学社吸引了一大批文学爱好者参与。不少刊登在《绿地》上的作品被各级刊物发表。

在繁忙工作之余，赵叶惠创作了不少诗歌、小说、散文、报告文学、文学评论等各类作品。1991年，他在湘乡市白田镇指导开展社教工作，利用晚上的时间撰写关于《三国演义》的系列评论文章。《智者千虑，终无一失——诸葛亮铸成大错》《不拘一格，唯才是任——曹操人才思想的核心》等10余篇人物述评，发表在《中国人事》《中国人才》《领导科学》等杂志。

2012年，赵叶惠的文学作品集《树林》在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，湖南作协主席唐浩明题写书名，中国作协副主席谭谈以《静水流深》为题作序：“静水流深可比喻为人生境界；内心世界丰富深

邃，外表温良敦厚，笑对人生，不为物欲所役，不为威武所屈，以期拥有和谐的生命，长久的快乐和真正的自由。也许，这正是赵叶惠先生所追求的，因为他的作品在不停地展示。”

如今，赵叶惠已在《诗刊》《中国文化报》《湘江文艺》等30余家省级以上报刊和中国作家协会、中国诗歌网发表诗歌350余首，小说、散文、报告文学、评论40余万字。继《树林》后，赵叶惠相继出版了现代诗集《梦乡的通行证》《春风胜过一切温柔》、古体诗集《平易行吟》《湘乡之韵》、散文集《风吹过湖面》。

对传统文化的守望与歌吟是赵叶惠文学创作的重要价值取向。如发表在《诗刊》上的《用脚丈量土地的人》《唯有屈大夫》《朗诵楚辞的少年》等，发表在中国作家网的《一颗古莲的新诗发了芽》，发表在中国诗歌网的长诗《伏生救危存亡吟》等，让人感受到传统文化的勃勃生机和恒久魅力，感受到作者对中华文化的挚爱、传承与创新。在工作中，赵叶惠对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也倾注着热情。他主持编写了《湘乡名人道德风范》《曾国藩生平事迹陈列》（与谭运良合作）《人大代表风采录》等书，他担任总主编的《湘乡历代文艺作品选编》（丛书）即将付梓。

赵叶惠的创作当然不局限于传统文化领域。他创作的视野宽阔，题材广泛，既有对自然美、人性美的热情礼赞，也有对假丑恶的严厉鞭挞。几十年来，他初心不改，孜孜不倦地写作。他是文学的忠诚守望者、歌吟者！

（赵叶惠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作者系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、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）

锣鼓弦歌里的烟火

陈衡阳

清晨的邵阳隆回滩头镇，薄雾还没散尽，镇口老戏台的檐角就先飘出了胡琴的调子。“啾啾呀——”一声婉转的唱腔划破晨雾，正在巷口炸米花的老刘手一抖，米花筒的“嘭”声也跟着添了几分节奏。“是《打鸟》！”他放下手里的活计，朝着戏台方向快步走去，嘴角早已扬起笑意。

早在清代乾隆年间，邵阳一带就有了“地花鼓”的痕迹。那时的农闲时节，村民们凑几个人，在晒谷场中央摆一张方桌当戏台，男人们反穿花布衫扮姑娘，女人们则敲着竹板当伴奏，唱的是《送郎》《采茶》这样的短调，演的是邻里间的婚嫁、劳作、赶集趣事。没有华丽的戏服，就穿自家染的土布衣裳；没有专业的道具，就用竹篮当花轿；甚至连唱腔都没有固定的谱子，全靠演唱者根据情绪自由发挥，调子跟着方言的韵律走，怎么顺口怎么唱。

这种“接地气”的表演形式，很快在邵阳乡村火了起来。道光年间的《宝庆府志》里就有记载：“岁末农闲，里人聚演花鼓，锣鼓喧阗，至夜不息。”那时的“地花鼓”，更像是一场全民参与的文化狂欢——台下的观众听得兴起，随时能接唱两句；台上的演员忘了词，也能即兴编一段生活趣事，引得台下哄堂大笑。正是这份不加修饰的“土味”，让邵阳花鼓戏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结下了不解之缘。

随着时间的推移，“地花鼓”逐渐吸收了邵阳民间的山歌、渔歌、灯调，慢慢发展成有固定唱腔、完整剧情的花鼓戏，还根据地域特色分化出“东路”“南路”“北路”三大流派。东路花鼓戏以邵阳东部的邵东、双峰一带为中心，唱腔明快活泼，像湘中春日里的阳光，热烈又温暖。经典剧目《刘海砍樵》是东路的代表作。南

路花鼓戏则集中在邵阳南部的武冈、新宁等地，唱腔婉转缠绵，似资江的流水，温柔又绵长。南路擅演情感细腻、细腻，比如《小姑贤》。北路花鼓戏以邵阳北部的新化、冷水江为核心，唱腔融入了楚剧的硬朗，多了几分豪迈与激昂。北路常演公案戏和战争戏，比如《生死牌》。

如果说流派是邵阳花鼓戏的“骨架”，那邵阳方言就是它的“灵魂”。无论是哪一派的唱腔，都离不开邵阳方言的加持——那些带着湘中语调的咬字、发音，让唱词有了独特的韵律感。比如“妹子子”“后生仔”这样的称呼，用普通话说出来总少了点味道，可一旦换成邵阳方言，再配上“打溜子”的锣鼓节奏，立刻就拥有了乡土的鲜活气。

在邵阳人的记忆里，花鼓戏从来都不只是一种艺术形式，更是串联起生活点滴的“情感纽带”。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，邵阳每个乡镇几乎都有花鼓戏剧团，逢年过节、婚丧嫁娶，只要搭起戏台，就能够吸引十里八乡的人来观看。那时的戏台，也是孩子们的乐园，我们一群小孩不爱看正戏，却总喜欢围着后台转。

如今，老戏台早已翻新，雕梁画栋间多了几分精致，却依旧保留着当年的烟火气。每逢节假日，戏台前还是坐满了人——有头发花白的老人，摇着蒲扇听得入迷；有带着孩子的年轻人，一边看戏一边给孩子讲解剧情；还有举着手机拍照的游客，想把这份独特的文化体验分享给更多人。

我忽然明白，邵阳花鼓戏之所以能流传两百多年，不仅是因为它的唱腔动听、剧情有趣，更因为它承载着邵阳人的生活记忆、乡土情怀，是这片土地上人们情感的寄托、文化的根脉。



钟水河。

通讯员 摄

钟水河畔是吾乡

马珂

钟水河从南边逶迤而来，到了我们村——嘉禾县石桥镇仙人桥村村口，脚步就慢了。

水慢下来，就清了，亮汪汪的，像一条青罗带子，轻轻系在村前。河对岸，一座石桥凌空横卧。说它是桥，其实更像一整块巨石，从山体里挣扎出来，又硬生生搭到了河对岸。村里人管它叫仙人桥，村子也就跟着叫了仙人桥村。

这座村唐朝就有了。开元年间的罗家人，寻寻觅觅到了这里，住就是一千三百多年。村后的古木，遮天蔽日，把光阴都挡在外头；村前的石桥，凌空跨着，像一道虹落到人间；桥下的钟水，一年一年地流，流过多少代人的日子，也流进多少代人的梦里。

如今，它既是中国传统村落，也是湖南乡村振兴的示范村。可你走在村里的青石板上，还是能觉出那种千百年都没变过的踏实——石板被岁月磨得温润，脚踩上去，不凉，倒像是踩在旧时光的脊背上。

先说这座桥罢。它就在村子南头，钟水河到了这里，水面阔了，水流也慢了。抬头看，两块天然巨石架成个“人”字，中间露出三角形的桥孔，上尖下宽，像老天爷用指甲随意捏出来的。桥长二十八米，宽有两米半，站在桥下的时候，你根本想不起这些，只觉得它天生就该在那儿，从盘古开天地就在那儿了。

桥孔东侧有个洞，洞口刻着“桃源洞”三个字，是清代一个叫雷德煊的贡生题的。洞不大，曲曲折折往里走，凉气就慢慢地漫过来，暑天里坐上一刻，汗就散了。洞右边有块石碑，滑溜溜的，泛着微微的光，村里人说那是“仙人镜”，能照见人影。我侧着身子斜望过去，还真能看见村里几栋老屋的檐角，影影绰绰的，像是照进了另一个世界。

过了桥往村里走，路就变成石板的了。两百多栋老房子，都是明清时候留下来的，青砖黛瓦，封火墙翘得高高的，像

一只只欲飞的鸟。石板巷子七弯八拐，把民居、祠堂、戏台、埠头都串起来，像一根线串起散落的珠子。村中间有座八角亭，亭子对面是古戏台，戏台临着水，台柱子上刻着副对联：“仙去多时，观遗迹却在此；江环如带，奏流水以何惭。”道光二年立的，算起来快两百年了。

戏台前有棵大樟树，我张开胳膊去抱，连一半都围不过来。村里人说这树一千多年了，树冠能盖住三十多米见方的地方，夏天半个村子的人都在底下乘凉。树干上爬满了青苔，摸上去滑溜溜的，能觉出里头藏着的水汽，藏着的光阴。有时候我想，这树听了多少出戏，看了多少代人？那些坐在树下的人，有的已经不在，可树还在，戏台还在，钟水还在流。

村里的老人爱讲罗四姐的故事。那是清朝时候的事了。说这姑娘天生一副好嗓子，唱起歌来，能让听的人呆呆地站上半晌。有一年她撑船顺流而下，到鱼峰山下跟刘三姐对歌，唱了三天三夜不分胜负。回来后她四处传歌，唱人间不平事，唱世间悲欢情。2013年，演刘三姐的黄婉秋还专程来过仙人桥，跟罗四姐的传人站在戏台前对歌，一唱一和，恍恍惚惚的，让人分不清是哪朝哪代的事——好像时光在这儿打了一个褶，清朝和今天叠在了一起。

还有一个传说，村里三岁小孩都知道。

说是东海龙王的三个女儿，看见人间过河辛苦，就奏请天庭给百姓架桥。最小的三妹相中了罗家村（现仙人桥村）这个地方，使法力驱来巨石，一夜之间架起这座石桥。后人感念龙女恩德，就把村子改名仙人桥。钟水河这个名儿，也是因为三姐妹对这片水情有独钟——上游的凌云桥、下游的岛石桥，都是她们的手笔，三座桥隔着河相望，像三姐妹守了一千多年，守着一个没说完的故事。

村后的山坡上，埋着几位红军战士。1934年11月，红三军团要抢渡钟水

河，在仙人桥一带跟国民党军队打了一仗。有十几个战士战死了，村民们偷偷把他们埋了，连名字都没留下。每年清明，村里人都会去上坟，烧几张纸，添几锹土。墓碑是后来立的，碑上没名没姓，只刻着“红军烈士之墓”。

这些年，村子慢慢热闹起来。电影《浴血罗霄》《芙蓉镇》都在这儿取过景。前几年拍《芙蓉渡》《半条棉被》，村里几百号人跑去当群众演员。大热的天，老人们穿着当年的衣裳，在河滩上一遍遍走戏，没人叫苦。电影上映后，外地人寻来了，村里人就自发当起导游，讲仙人桥的来历，讲拍电影时的趣事……青石板上多了背包的年轻人，戏台前多了照相机的快门声，古村还是那个古村，只是多了些人间的热闹。

2021年，仙人桥村成了省级乡村振兴示范村。村里人盘算着把日子过得更好些：河边种了牛奶草莓，冬春时节来摘的人不断；山坡上辟了葡萄园，夏秋时节挂满晶莹的果子；七百亩土地流出去，种了蔬菜供应城里。去年村里把老房子修缮了一遍，路也硬化了，墙上画了村里的故事和电影拍摄的场景。

村口的公路桥是1962年修的，就建在天然石桥旁边，车来车往的，跟古桥隔得不远。有时我站在老桥上，看新桥上汽车驶过，恍惚间觉得时间在这儿打了个褶——这边是唐朝的石头，那边是今天的生活，中间隔着一千多年，却又能同时看得见。

桥下的钟水还跟从前一样流着，不急不慢的，像它从来就是这样。水面上晃着仙人桥的倒影，晃悠悠的，把石头晃软了，把时光晃慢了。古戏台的余音还在祠堂间绕着，绕来绕去的，不肯散；草莓的甜香从田里漫过来，漫过青石板，漫过老屋的檐角，漫进每一个黄昏里。

这村子，惊艳了时光，也醉美了人间。在古老的石头和新鲜的日子里，就这么一天天过去——像钟水河的水，流着，流着，流成了日子本身。

记忆中的“湖南制造”

马珂

傍晚闲坐书房，看春风轻轻拂动窗帘，不禁勾起我对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念想。那些远去的时光，清苦却温热，朴素而踏实，其中便有当年与我们相伴朝夕的“湖南制造”。它们带着三湘大地的烟火气息，成为一代人心底最柔软、最难忘的记忆。

湖南日用化工厂出品的马头牌肥皂，是我童年最熟悉的日用品之一。方方正正的米黄色形体，凑近轻嗅，有股清冽干爽的皂角香气。奶奶总在早饭后洗衣，把浸泡后的衣物平铺在木质的搓衣板上，再拿马头肥皂细细擦拭，让白色的泡沫慢慢泛起。肥皂用到最后只剩细碎的一块，奶奶也不肯丢弃，装进针织小网兜里挂在盆沿。当年尚未入学的我，总蹲在一旁静静地观看，偶尔将小手浸在肥皂水里，让泡沫裹着手背，顿感凉丝丝的。

红色圆形铁盒里的青春洗发膏，是那个年代独有的青春印记。盒面上长发

姑娘的图案，端庄清秀，是那时最朴素的时髦。我随做教师的母亲在外乡求学时，发现她书桌抽屉的最里面，总藏着一盒青春洗发膏。母亲一生节俭，平日洗头只用香皂，唯有逢年过节、走亲访友才会用它。铁盒里白色的膏体浓稠绵密，指尖轻拨少许，便能揉出满头蓬松的泡沫，清水冲净后，发丝乌黑柔顺，清香萦绕，整个人都显得神采奕奕。一盒小小的青春洗发膏，藏着母亲对美的向往，对生活的热忱。

那时候的夏夜，暑气蒸腾，蚊子滋扰，细微的嗡嗡声总在耳边萦绕，一叮便是又痛又痒的红包。我家窗台边常年摆着津市出产的斑马牌蚊香。深绿色的盘香顶在小巧的铁架上，点燃后青烟袅袅，淡淡的草木清香缓缓弥漫。母亲任教的学校只给她分了一间小住房，一张床铺，我便在地面铺上竹席打地铺入睡。躺在微凉的竹席上，看月光透过窗棂，缕缕青

烟在光影里轻轻飘散，总会想起老家的夏夜：奶奶在搪瓷盆里点燃了雄黄粉的锯末，烟雾徐徐散开，把恼人的蚊子悉数驱走。她摇着蒲扇，坐在淡淡的烟霞里，轻声讲着老故事，我就在奶奶的故事中悄然入梦。

我刚上初中那年，家里购买了一台便携式橘子洲牌收音机，株洲无线电厂出品。乌黑发亮的机身，银白色旋钮泛着柔美的光泽。每天清晨，父亲总会早早拨动开关，新闻、戏曲、天气预报等，随着播音员清脆悠扬的声音填满简陋的小屋。父亲当年下放到农村务农，农忙时节，他会把收音机带到田埂地头，劳作间隙听上一段，疲惫感随之消散；阴雨天闭门不出，一家人围坐桌旁听评书、听歌曲，满屋子的热闹与温暖。在那个娱乐匮乏的年代，这台收音机装下了我们全家最朴实、最纯粹的乐事。

改革开放后，下放农村的父亲返城

工作。次年春节前夕，家里添置了一台韶峰牌黑白电视机。木质外壳厚重朴实，机身背部微微凸起，搬回家的那天，邻居们纷纷赶来围观。此后的每晚七点，父亲都会准时开机。荧屏上闪过一阵密密麻麻的雪花点后，图像渐渐稳定。吃过晚饭的一家人围坐在电视机前看新闻、看剧集，就连插播的广告也看得津津有味。这台本省制造的韶峰牌黑白电视机，点亮了我们无数个多彩的夜晚，让我们燃起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憧憬。

时代浪潮滚滚向前，市场经济蓬勃发展，那些陪伴我们长大的老物件，如今已悄然淡出日常生活。可马头肥皂、青春洗发膏、斑马蚊香、橘子洲收音机、韶峰电视机等，却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湖南人的骄傲与荣光，是本土匠人用心打磨出来的精品。这些带着烟火气的“湖南制造”，陪伴我们走过清贫却温暖的岁月，承载着三湘大地的醇厚温情。